

《書評》

《彼時與此時的歷史教學：學校恆定與 變革的故事》

REVIEW OF LARRY CUBAN'S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劉哲瑋 單文經
Che-Wei Liu Wen-Jing Shan

壹、前言

本書評的第二作者長期關注《彼時與此時的歷史教學：學校恆定與變革的故事》(*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以下簡稱《彼》)一書作者，美國史丹佛大學教育學院的榮譽退休教授萊瑞·庫班(Larry Cuban, 1934-)述及當代學校課程與教學改革歷史發展的著作，且參考他相關觀點撰成若干論文(單文經，1994，2000，2004，2005a，2005b，2006，2012)。俟第一作者於106學年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哲史組博士班就讀後，即在第二作者的鼓勵下，由第一作者領銜合作完成另一論文(劉哲瑋、單文經，2018)。本書評的撰寫為又一合作的成果：先由二位作者各自閱讀該書，以及迄目前為止已經問世的四篇書評(Halvorsen, 2017; Seixas, 2017; Spoehr, 2016; Swerdlow, 2017)，經二人討論若干次，由第一作者先行撰成初稿，再由第二作者增刪而成。

劉哲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哲史組博士生

電子郵件：80600001e@ntnu.edu.tw

單文經，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電子郵件：wjshan@ntnu.edu.tw

本文評介：Larry Cuban (2016).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貳、簡介《彼》書作者、成書緣由與主旨

庫班（Larry Cuban, 1934-）在史丹佛大學教育學院任教約二十年，曾開設過不少各式各樣的不同課程，主要集中於學校教育及課程與教學改革歷史、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務，以及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等方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進入大學任教之前，他不但在若干所高級中等學校教授歷史科長達 14 年的時間，更曾經在三個學區擔任過一共七年的學務總監（superintendent，或譯教育局長）。因為有這些在基層教育服務的經歷，使他在研究與討論教育的學理、實務，甚至歷史的發展等不同面向上，皆有更貼近現實、且深入而獨到的見解。

庫班在大學時代曾經受過完整的歷史專門科目的訓練，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又在高中從事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歷史教學，所以他一直都很注意這方面的情况。《彼》書即為他就著自己於 1950 年代於兩間高級中等學校從事歷史教學的經驗，配合現今同樣的兩間學校歷史教學的現況互作比較之研究成果。

庫班透過身為歷史學家所使用的觀念與方法，藉由他的視野，希望《彼》書的研究發現對於與歷史教學有關的教育政策興革能有所幫助，最終目的是希望能讓學生們，尤其是在城市區的學生們，不只能夠在歷史科目學習的更為深入、更快速，且學得更好，更希望對他們在其他科目，乃至整體的學習成效皆能有所提昇。

就全美各地的學校而言，歷史學科是學生所必須修習的科目之一，政策制定人員、老師、父母以及納稅人，都常告訴學生們要用心學習國家開國者的事蹟、憲法、民主主義以及傳統規範，並要求他們要珍惜與保留這些知識與信念。這樣的史學式歷史教學，出發點是以保存過去的傳統文化為重，歷史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稱之為「傳統式的歷史教學」（heritage approach to teaching history）。

另一方面，這一群人又希望學生們，不只要能夠吸收與欣賞過去的傳統，還要能夠學習諸如問題解決、質疑、以及分析理念等歷史的思維技巧。他們希望學生們能夠把所學習到的知識以及技巧運用在社區及國家的思考當中，俾便學生們能夠批判停滯的現狀，並且尋求興革之道。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歷史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稱之為「史學式的歷史教學」（historical approach to teaching history）。

雖說歷史教學應兼重這兩種方式，但是，維繫傳統與改變現狀這兩個不同立場，不只在歷史科目的教學之中存有矛盾，在持續謀求改革的公立學校、管理、組織、課程教學方法等各方面，也存在著衝突。一方面，人們期待能夠透過包括歷史科目在內的各科課程與教學，塑造出良好的公民，並且培養具備進入職場能力的下一代，俾便增進學生的幸福以及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人們又期待能夠在學校的教育發展過程中，各級學校都能夠做出相應變革，使學生對自我、社區，乃至社會與國家的進步與改革，能夠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如此，人們方有可能在國家的傳統信念與價值永續傳承的前提之下，期待一個不斷求取進步的學校與持續向前發展的社會。

由此一觀點出發，庫班在《彼》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俾便引導讀者做一系列的反思，即「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在高級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中，做出了什麼樣的變革？而又在哪些方面維持了不變？」庫班希望透過他自己過去在高級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經驗，以及近若干年來的高級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現場的觀察研究，了解在學校教育改革的潮流中，一些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歷史教學的實行者，在執行兩種相異的重要價值觀時所面對的矛盾與複雜的情況，並且試為這些情況探求成因，進而思索改進而因應之道。

參、《彼》書各章大要

《彼》書共設六章，以及作為附錄的〈方法論〉，共256頁。茲謹就六章本文逐一簡介其內容大要。

第一章〈格倫維爾高中的教學，1956-1963〉（Teaching at Glenville High School, 1956-1963）中，庫班把時間點拉回到1956的時間，當時他在位於俄亥俄州克里夫蘭的格倫維爾高中教書，當時的背景，克里夫蘭有90%都是非裔的美國人，而在格倫維爾高中，有99%的學生都是非裔的美國人，學生來自不同的社經背景，包括了中產階級、勞動階級以及貧窮的家庭。在當時庫班只是一個新手老師，沒有太多的教學經驗，儘管他在匹茲堡大學修習過強調「進步」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課程，但

在面臨一開始教學時，就要教授五個班級的課程，且一個班級大概有 30 個學生，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在教授美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前的準備工作需要完成，這樣龐大的工作負擔下，他不得不回歸到傳統式的教學方式，以傳統講述課程、參考書閱讀、以及練習卷等方式進行教學。

隨著往後教學經驗逐漸成長，也比較熟悉教學的作法，面對著對於課堂上總是不積極參與、不感到興趣的學生們，庫班決定要開始做一些實驗性的改變，這樣的改變，一開始就是先從課程的內容以及教學方法開始著手。他首先在教學的內容上加入了有關於「非裔美國人的歷史」，也就是當時所稱為的「黑人歷史」，以及時下的議題或事件融入課程當中，在星期五的課堂上，還特別教授關於當地、國家、乃至國際的事件，來讓學生更明白這些事件的前因背景。

他也使用了第一手的資料，應用在課程當中，來教導學生進行像是如何做證明、資料搜尋、以及詮釋等歷史思維技巧，甚至還設計以兩個星期為一單元的課程，針對當代議題，來引導學生做批判思考，更在活動中加入了個案學習討論以及模擬審判等等活動。庫班融合了「進步的教學方法」（*progressive teaching approach*）以及「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獨創一格，發展出「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融合的教學技巧」（*a hybrid of teacher -and student-centered techniques*），成功的提升了學生們對於課堂的參與度。

經過七年的時間在格倫維爾高中發展出這種「重理解」方式的美國歷史與世界歷史課程後，他深信願意為教育做出奉獻而且有知識的老師，可以透過創新的教學方法以及相關內容，來改變貧窮的城市學校現況，以及為他們帶來社會上的變革，所以在 1965 年時，他接受了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卡多佐高級中學的職位，擔任起「師傅教師」（*master teacher*）的工作，除了要教授自己班級的課程，同時也要負責一個實驗性的學校老師教育計劃，負責對從「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回國，對於城市學校的教育富有興趣及熱忱的老師進行教育訓練。¹

第二章〈卡多佐高中教學，1963-1967〉（*Teaching at Cardozo High School, 1963-1967*）主要在描述庫班在卡多佐高中服務的情形，在擔任師

¹ 和平工作團為派遣志願工作者到貧困國家服務的一個美國組織。

傳教師的職位後，庫班接下了主任的職位，在教授兩門高中歷史課程同時，也研發一些新的課程，並且負責管理指導4~10位實習老師，而這些實習老師一天會教授兩堂課程。卡多佐也是一個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學校，然而在背景上比較不同的是，卡多佐的學生們，主要來自於比較貧窮的家庭，且班級人數較多，平均一個班有45位學生。

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學校，大部分是屬於高度政治化而且科層化，因此所有的學生，都被界定劃分於死板並且以標準測驗分數而分割成的四軌體系當中。²無論師傅教師或是實習教師，都會分派到這四個軌系中去擔任教學，但作為最簡單、最基本的美國歷史課程，卻也是最難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往往都會平均分配給師傅教師以及實習教師負責教學。庫班與那些實習教師們都發現那些低成就的學生，因為絕大多數都擁有負面的學校生活經驗、對學術科目有分離感、以及讀寫能力方面受到限制等不愉快與困難，如何找出一些方法來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並且建構出適合這些學生的課程與教學，不管對於實習教師或者是師傅教師來說，都是一項挑戰。

庫班也發現，通常有問題的學生，都面臨著長期以來始終存在的貧窮與種族歧視問題。而在學校當中，要有所變革，主要仍與當地的組織架構與教育政策有很大的關係。他也從經驗中發現到，雖然具有教學經驗熱誠來執行教育的老師很重要，但是要對於這些城市學校真正做出實際上的變革，遠比他想像中的還要複雜許多。

在卡多佐高中的教學時期，庫班也加入了更多以探究為主的教學方法（inquiry-oriented approaches），當中引用了新社會學習運動（New Social Studies movement）所提供的一些題材資料，還設計了有關於甘迺迪總統刺殺案件的單元主題來引導學生學習歷史思維。

第三章〈新社會學習與新歷史〉（The New Social Studies and the New, New History）則描述了發生在1960年代以及1990年代發生的，將歷史置於社會學習領域這項作法所引發的爭議，以及此一爭議對於學生在歷史學習的影響。在這章當中，也描述對這兩個不同時間點，課程政策改

² 四軌體系（four-track system）是指一般（General）、基礎（Basic）、大學預科（College Preparatory）及榮譽（Honors）等四個軌系。

變延伸到課堂的情況。庫班於概述 20 世紀初期到現在，主張將歷史納入社會學習領域，以及主張歷史應保持獨立學科地位，這兩派人士所發生衝突的背景之下，描述了對於倡導「傳統式歷史教學」以及「史學式歷史教學」這兩種不同教學方式人士之間持續不斷的爭辯。

倡導傳統式的歷史教學一派認為，歷史教學的目標是要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歷史知識的教學，其中也包含了教導學生身為公民的驕傲以及愛國之心。相對地，支持史學式的歷史教學的人，則反對這種只有單一面向的歷史解說方式，希望教導學生能夠精通歷史思維的技巧，進而用以評估經由客觀分析證據所得到的歷史敘事是否適切，這樣才能夠對於過去與現在史實的複雜性，有比較多方面的理解。

對於庫班而言，在這兩種方式當中，比較喜歡使用歷史思維的教學方法，也指出在學校教育上，既希望學校能夠保存傳統的價值與理念，同時又希望能提供學生適切的歷史知識與技能，這樣的作法為歷史教育工作者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另外，庫班在第三章中也深度地檢視了三個歷史事件，分別為 1960 年代推出的新社會學習運動、在 1990 年代發生的全國歷史標準的爭議事件、以及新近提出史學式歷史教學的作法；後者是指由史丹佛歷史教育團隊（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SHEG）所研發的，他名之為「新新歷史」（New, New History）的歷史思維課程。

庫班在第四章〈現今的歷史教學－格倫維爾高中〉（History Teaching Now—Glenville High School）與第五章〈現今的歷史教學－卡多佐高中〉（History Teaching Now—Cardozo High School）當中，記錄了經過半世紀的時間之後，也就是在 2013 以及 2014 年間，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兼自傳作者的他，回到格倫維爾以及卡多佐高中，坐在若干教室中親身體驗歷史教師課堂教學的一般情況。他不只是舊地重遊，而是帶著他五十年前在這兩所學校從事歷史教學的記憶，與他新近觀察到的歷史教學情況作一比較。

當然，作為一位有著清晰頭腦與聰穎智慧的庫班，提醒自己切勿墮入輕易就著現今所觀察到的諸多相似情形，即於歷史教學的內容與方法兩方面，遽下若干判斷。他小心翼翼地注意到過去與現在，歷史教學乃至一般教育各方面條件都有所不同，例如人口、整個城市與學區的政治狀況、學

校組織等所產生之相當大的變化。為此，他確認了在這些條件變化的影響之下，這兩所學校的狀況，包括歷史教學的情形，的確有一些「變革」，但是在一些學校組織結構方面，例如學校行政的運作、有關課程與教學的規定、學生學習表現評量的作法等等，對於教師教學乃至學生學習的行為規範，則維持著相當大程度的連續性。這兩章也針對歷史教師現在是如何進行教學，而又是哪些鉅觀與微觀的影響因素，決定了現在課堂上樣貌的形成，作了十分詳細的描述與分析。

最後一章，也就是第六章〈歷史課堂的恆定與變革，彼時與此時〉（*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and History Classrooms, Then and Now*），庫班綜合比較了兩所城市高中在個案研究中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且最後總括在兩個不同時間點的資訊來回答本書的中心問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在高級中等學校的歷史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中，做出了什麼樣的變革？而又在哪些方面維持不變？」

庫班在《彼》書的結論中提到，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公立學校以及教室課堂在本質上沒有什麼進步。此一結論或許會使得一些關注教育改革成效的人士感到失望。不過，此一結論值得一些熱衷改革、卻未存有正確歷史觀點的人士反思，所謂的改革「希望」是不是經過特定人士執意炒作出來的「天真的想法」？此一結論也值得一些倡行改革的政治或教育領導者深思，未經深思即「跟風」的作法，有其必要嗎？

庫班在《彼》書最後七、八頁中，以名為「那又如何呢」（*So what?*）一節，就著全書的總結提出了四點對於當前美國學校變革的作法，提出四點建議。

其一，政策制定者要改變「把學校辦好，特別是把一些所謂的『辦得不好的學校』（*failing schools*）辦好，就能增加學生的學力，提振美國的『人力資本』，進而增進美國的國力」。

庫班帶著讀者們探討一些人士為什麼汲汲於尋求變革？其間的關鍵在於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從政人士往往都受到「變革就是進步」的觀念所驅使，讓一般學校忙不迭地處於持續受到變革的要求，彷彿不變革就是落伍，就應該受到譴責。過去 40 多年來的政府、精英、企業家、以及教育領導者，都信守了 1983 年發布的《國家在危機之中》報告書的觀點。報

告書當中明白指出學校改進與全國經濟成長在國際市場的全球競爭力有所關聯，因此積極想要增加所謂的「人力資本」，更因此增加人力資本這樣的觀念，打動了執政者，經營公立學校及其教育的目的則轉變成以經濟為目標，取代傳統增加道德、增加個人及社會福祉的信念。

為了因應這各方面的政策取向，不論是聯邦、州、或者是行政區域的政策制定人員，都採納了增加家長的學校選擇、全新課程標準、實施更多標準化的考試、以及使用高科技讓下一代能夠具備 21 世紀的技能等措施，而這些變革的目標，最後得到的結果與成效卻不大。然而，如庫班所明示者，學校變革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教育的興革與改變有相當大的複雜性，而這些複雜性是來自於學校、教室、與行政區中一持續恆定與變革的複雜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採用了政策之後，最後對於沒什麼變革的事實而感到失望的原因。

庫班指出，之所以有如此的情事發生，關鍵之一是由於這些改革者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又把變革的過程看得太過簡單，只用他們狹隘的眼界想要透過學校的教育來達到人力資本的發展，忽略及窄化了大環境背景的影響（社區的人口統計、行政區的組織、以及政治和政策等），以格倫維爾以及卡多佐這兩所學校來說，一直存在的貧窮以及種族問題，就是這環境當中的一部分。

其二，政策制定者要認清「固然要自學區、社區、社會、國家等方面作『鉅觀的』學校教育變革，但也要從『微觀的』的角度，為學校、課堂的教學帶來核心的變革」。唯有多管齊下，方能徹底地帶動全面的變革。

庫班指出，證據顯示，變革計劃一直持續地在行政區、學校以及課堂中發生，行政區管理者制定不同的政策給學校遵守，學校也會發展出一些新的課程，教師也改變了教室中的任務。然而，「變革」的發生是明確的事實，但是這一些改革人員，卻忽視到變革的重點—「學校教育的文法結構」（grammar of schooling），也就是一些橫亙在學校核心的傳統體系架構運作模式，例如，學校行政組織、人事經費法規、課程教學安排、學校課室管理、日常行事慣例等等行之已久，卻難以撼動的學校本質體制，而這正是教育改革所要優先考慮到的核心因素！

第三，大家都要有「教師才是最重要的政策制訂者」的覺識，在進行任何變革計畫時，都要自始自終納入學校現場的教師，才有可能訂定確實可行且真正帶來課程與教學的變革。

庫班指出，絕大多數的教育改革者對於教師在執行課程改革當中擔任守門人角色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覺識。沒有做到與老師們先做諮詢，以及設想過他們的需要、專業，以及他們對於學生的理解性，這些改革者大大的在基礎上自我破壞了教育改革的目標。他也認為改革者並沒有看到在學校、區域、教室當中所同時存在複雜的變與不變的模式，以在格倫維爾以及卡多佐這兩間學校的改革設計為例，希望能夠提供一些增加性的變革（如：新的課程、新的科技、新的課程標準等）以及對於基礎上的改革與改變結構（如：校中校、教育券、特許學校、大規模的線上教學等），這些都沒有辦法達到教育改革者希望學生能夠在學術表現上面有所進步的目標。

第四，歷史教師，特別是高級中學的歷史教師，宜謹記「著重歷史教學內容、歷史知識傳承的『傳統式的歷史教學』與著重歷史教學技能、歷史思維方法的『史學式的歷史教學』二者應予兼顧，而不應陷於『非此即彼的難題』（either-or conundrum）中」。

庫班指出，「傳統式的歷史教學」與「史學式的歷史教學」二者之間確實存有緊張的關係，但是，二者原本是不可分立的二者，因而，他大聲疾呼，希望歷史教師，特別是高級中學的歷史教師要跳出「非此即彼」的泥淖，在有限的教學時間盡量兼顧二者，站在任何一端而輕忽另一端，對於自己的教學、學生的學習，乃至社會國家整體教育的觀點來看，都是一種遺憾。

肆、本文作者對《彼》書的評論—代結語

本文作者同意密西根大學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學系社會學習領域教育專長的哈沃爾馨（Ann-lise Halvorsen）教授對於《彼》書的評論：「該書無可批評者」（little to criticize）（Halvorsen, 2017:132）。本文作者也同意 Halvorsen 接著這一句評論之後所指出的，也許唯一可能批評的就是很

多讀者可能會要求庫班應該再寫得多一些，諸如：希望庫班就著他從作為一位在若干所城市學校教學的年輕歷史教師，如何掙扎奮進才能成為受學生歡迎且教學效果良好的教師，多作一些敘述；希望庫班就著對於現今歷史教學作更多的描寫與建議；還希望庫班就著《彼》書的副題，也就是有關「學校恆定與變革的故事」作更多的討論。

Halvorsen 具體地指出，《彼》書第三章中，除了庫班所提及的史丹佛歷史教育團隊（SHEG）之外，還可以針對其他新近發展的一些歷史教育新猷，作一些評介。Halvorsen 也建議庫班在第六章，還可增加對於高級中學歷史教師的職前師資培育方面，提出一些說明。另外，如何讓為數約五萬七千名高級中學歷史教師之中，有更多人願意採取較傾向學生中心式，或者較偏重著眼於學生歷史思惟能力提升的史學式教學方法，進行歷史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與實施，應該是庫班及所有這群教師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當然，本文作者也同意 Halvorsen 在其書評末了指出的，庫班這本《彼》書不只限於歷史教育的討論，還處理了一些當前美國教育的重要問題，諸如種族隔離（segregation）、教師專業化、教育改革、初任教師的引領與指導（teacher induction and mentorship）、領導、政策與實務的關係，乃至於學校教育的宗旨等問題。因此，Halvorsen 認為教育史家、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的教授、在職與未來的歷史教師等人都應該會發現《彼》書是一本能激勵人心、提供豐富訊息，且讓人樂觀以對美國教育發展的好書。最後，Halvorsen 指出，雖然庫班的研究顯示，他新近於 2013 年及 2014 年觀察的兩所學校，仍然以教師中心且偏向傳統式教學的歷史課堂教學居多，而且，這種情況也代表了當今美國的一般情形，但是，庫班的研究也樂觀地告訴讀者，他於 1950 年代所運用的創新、紮實，且能與美國文化相配合的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在今天仍然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 單文經（1994）。教學科技與媒體在師資培育上的應用。**教學科技與媒體雙月刊**，**18**，3-12。
- [Shan, W.-J. (1994).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media for teacher preparatio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Media*, 18, 3-12.]
- 單文經（2000）。析論抗拒課程改革的原因及其對策：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集刊**，**45**，15-34。
- [Shan, W.-J. (2000). The causes of the resistance to curriculum reform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A case of Taiwan 1-9 New Curriculum.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45, 15-34.]
- 單文經（2004）。論革新課程實驗之難成。**教育研究集刊**，**50(1)**，1-32。
- [Shan, W.-J. (2004). On the difficulty of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reform mov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50(1), 1-32.]
- 單文經（2005a）。Rugg 及 Bruner 社會領域課程改革經驗的啟示。**教育研究集刊**，**51(1)**，1-30。
- [Shan, W.-J. (2005a). What can we learn from Rugg and Bruner's experience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51(3), 1-30.]
- 單文經（2005b）。美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爭議始末（1987~1996）。**師大學報－教育類**，**50(2)**，1-25。
- [Shan, W.-J. (2005b).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Standards Project, 1987-1996.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Bulletin-Education*, 50(1), 1-25.]
- 單文經（2006）。教改性質的歷史分析。**教育學報**（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2006(2)**，25-35。
- [Shan, W.-J. (2006).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reform: Tinkering toward educational Utopia. *Education Journa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2006(2), 25-35.]
- 單文經（2012）。對教學科技與媒體運用的一些思考。**教學科技與媒體**，**100**，4-14。
- [Shan, W.-J. (2012). Some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media.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Media*, 100, 4-14.]
- 劉哲瑋、單文經（2018）。老調新彈話課堂中教育科技使用的情況。**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1)**，277-285。
- [Liu, C.-W., & Shan, W.-J. (2018).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Monthly*, 7(1), 277-285.]
- Halvorsen, A. (2017). Book review for Larry Cuban's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7(1), 130-132.

Seixas, P. (2017). Book review for Larry Cuban's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Histor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 Revue d'histoire de l'éducation*, 29(2), 158-160.

Spoehr, L. (2016). *Book review for Larry Cuban's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Retrieved from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62436>

Swerdlow, L. K. (2017, April 5). *Review of Teaching history then and now: A story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chools*, by L. Cuban. *Education Review*, 24.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4507/er.v24.2216>